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肖宗志

(南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摘要]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关键词] “听鼓者”; 晚清; 地方吏治; 消极影响; 原因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5-0048-04

“听鼓者”直接在地方省份等候补缺,在此期间,或署缺,或差委,临时性地参与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诸事务,是其他朝代没有而清朝所独有的现象。到晚清,“听鼓者”大量积聚,数量庞大,其素质也参差不齐。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听鼓者”的腐败成为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

“听鼓者”是人们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当然,地方官员包括文职和武职。因为武职的事务限于兵事,社会影响有限,在这里,我们主要以候补文官来说明问题)。这些官员等候地方大吏在辕门外贴出的牌示,以便奉谕去署缺和差使,这一等待过程被称作“听鼓”。“听鼓”的本意是指官员到衙门值班当差。官府早上击鼓,官员听见鼓声前去应卯,开始上班治事。下午再次击鼓,表示放衙下班。后来官员候缺、候差也叫“听鼓”。^[1]如说:“前办巡防西局委员候补从九高筱云二尹交卸后,在申听鼓。”^[2]这是说候补县丞(从九品)高筱云办理巡防事务结束后,在家等候下次差遣。又如,“鄂省仕途拥挤,往往终年听鼓,不得一差”。^[3]从清朝官员引见的履历档案看,晚清的官员一般都有“无实缺候补”的经历。自然,这些候补官员在没有实缺,等待得到署缺和差使机会的期间,就成为“听鼓者”。如,“平时省垣‘听鼓者’更或课以策论,第其优劣而高下之”。^[4]或说:“窃愿各省悉仿而行之,俾‘听鼓者’概屏虚文,潜心实学,并可尽祛蒙蔽之弊。”^[5]

地方候补文官的概念,有两种理解。狭义的候补文官是指试用期满,经过地方督抚的甄别,留省补用的官员;或者指

因劳绩,经过保举,发往地方省份补用的官员;或者指通过捐纳,并捐免试用,直接分发到地方补用的官员。广义上讲,地方候补文官泛指已经经过吏部铨选,而没有得到实缺的官员,包括在省试用、委用和候补的官员。这些官员进入到任用阶段,而不是铨选阶段。实际上,在一些正式的奏折、文稿中,常常将学习、试用、即用(无试用期)、委用和补用官员都统称为候补人员。例如,陈宝箴1897年向光绪皇帝上《循例选派候补人员充当乡试房考折》,提出:(湖南乡试试差人员)“其不敷之数,考选得截取进士知县费道纯、即用知县杨瑞麟、刘宝寿,候补知县刘人骏,遇缺先用知县赵从嘉,截取知县许堃,试用知县龚开晋七员,均由科甲出身,文理优长,堪充内帘房考。臣于八月初六日封门后,派令该员等与实缺各员一体分校。”^[6]这七位充当试差的官员都是正途候补官员。又如,《江宁课吏馆考试事宜》称:“候补各员无论正途、劳绩、试用及有差与否,亦无论卸事回省及本来需次暨初次禀到但系在省者,均应报名与考。”^[7]很显然,在这里,实缺以外的文官包括即用、试用和补用等都被认定为候补文官。清代的候补官员是指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使的形式,在中央部门和地方从事各项临时性、差遣性事务,但多数时间赋闲、“听鼓”的在册官员,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有官职而没有实缺,这与实任官员区别开来;二是通过吏部分发,或地方大员的奏留、咨留,从铨选阶段进入到实际任用阶段;三是或长或短地参与中央和地方行政与社会事务。后两点把候补官员与候选官员区别开来,同时将实官与虚衔(不参加铨选,仅有职衔)区别开来。

地方候补文官的职事性质,何士祁将其定义为:“无地方之责,而办地方之事。”^[8]候补官员到首府发审机关审理京

[收稿日期] 2008-07-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2007年科研立项课题(编号:07YB1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宗志(1964-),男,湖南常德人,南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控和省控等案件,就十分普遍。如四川发审局,就是部选实任官和在省候补文官练习政事之所。“不特候补人员才具明敏者,到省之初,多委入局学习,即部选实缺州县,到省后,亦须学习数月,始能飭赴本任。候补人员则由学习升副委,再升正委,且须审结案件,著有成绩,始能予以委署”。^[9] 1838年,张集馨署太原府,是为省会首府知府。吏部分发县令20多员到省,张集馨认为他们“皆书生不知吏事”。于是派刘叙等10人到首县学习,派陈景增等10人在首府学习,并且“每晚令阅律例,次日互相讲求”。^[10] 候补官员从事的事务多数是临时和机动的,所以,他们常常是辅助角色,以受人差遣为常态。

候补官员的存在形式是有临时性职事和赋闲两种,不过对一般候补官员来说,赋闲的时间大大多于有职事的时间。他们在地方的职事方式主要有学习、委署和差使。这些官员在候补期间,都有获得署缺和差使的可能。因为地方署缺机会十分有限,差使的机会大大少于候补官员的人数,而且候补文官没有任何法定和经常性的收入。为了解决署缺、差委机会“短缺”的矛盾,地方大员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调剂。这一制度设计就是轮委、酌委兼用的署缺制度,署缺的时间最长为1年。有人说:“一省之中大小候补班至于千人百人,后来日众,拥挤日甚,上司应接不暇,设为轮署挨委诸法,聊以疏通。”^[11] 到晚清,委员差遣也十分多见。光绪五年,甘肅铭奏,“各省督抚差遣者,例有委员”。^[12] 地方性差使比较多的,一是时间长短不一、名目繁多的“例差”。如“每岁委员赴各厅州县催提地丁津贴捐输,春秋两季,例各一次,此外如催提盐课杂税及察积谷等差委,亦随时均有,谓之短差”。^[13] 二是时间相对较长的局、所、办的职事,差使人员大多数相对固定。新式局、所、办的管理人员一般由候补官员充当,上层人物总办、会办、提调等,则由候补道、候补知府等来担任。他们任职的时间相对较长,这是因为多数局、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非编制内的一个常设机构。

候补官员作为实任官员的补充,其存在是清朝的一种制度设计,其有限存在是必要的。它有利于弥补清朝行政体制结构性的缺陷,缓解“差委乏人”的矛盾,有利于“历练”人才等。但是,物极必反,当“听鼓者”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时,其存在就会产生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

二

候补文官在地方长时间地等候题补实缺,而且很难得到署缺和差使的机会,这种现象在清朝前期是不多见的。雍、乾时,“纲纪肃清,士非科甲进身不得遽登仕版,凡策名委贇者,非实缺即要差,绝无听鼓辕门终年寥落者。”但到嘉、道年间,与清朝中衰相伴,候补官员数量堆积的现象就已经很严重了。“约计每省中候补人员至少必有千人,而得有差缺者,不过十中一二。其余则皆无缺无差,终岁浮沉宦海”。^[14] 到了晚清,特别是咸丰军兴之后,“听鼓者”的数量持续扩大,“听鼓者”赋闲的时间大大延长。

这些“听鼓者”被时人看成“四非”人员,即非官、非工、非农与非商。是官,但无实缺、专责和法定俸禄,也不事生产和买卖。在四民分野、各本其业的传统社会,“听鼓者”显然

是一群另类。晚清庞大的“听鼓者”麇集省城,导致人事关系十分复杂和官场风气不良。候补官员为获得署缺、差委和转、升迁的机会,贿赂公行。候补官员适用的酌委制常常成为大吏安置亲信、私人的法定外衣,其负面影响广泛、深刻和持久。晚清的有些官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候补官员对吏治的破坏。“今日而言吏治,其必自候补始矣”。^[15] 对此,我们可作两方面的理解。候补官员对晚清不良的地方吏治要承担相当的责任;要改善晚清吏治,则必须首先对候补官员和候补积存现象进行整顿和治理。“前代之冗官在闲散,我朝之冗官兼在候补”。晚清官员朱采如是说,又指出了清代与其他朝代吏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异。闲散是指有官有位,但人浮于事的现象。而清代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官而无位的候补官的大量存在。还有一些议论尖锐地批评“听鼓者”及其作为。如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吴寿龄奏称:“吏治之坏,坏于现任人员者半,坏于候补人员者半。捐例开而仕途杂,保举滥而名器轻,因之人鲜廉耻,奔竞成风,虽以读书明理之人,亦皆诱于习尚,而忘其所学之何事。处处有官多之患,人人有自顾之忧。”^[16] 晚清重臣张之洞长期任职地方,对此体会更加直接和深刻。他在1899年指出:“候补人员过多,最为吏治之累,钻营者妄而为生事,朴拙者被挤而困穷,有才者乏见长之方,年深者无循资之望,以致营营扰扰,求缺求差,绝不知安分之可贵,干求之违法,殊于政体有碍。”^[17] 具体来说,候补官员败坏地方吏治主要表现为:

其一,为获得署缺和差使的机会,候补官员奔竞成风,助长糜烂的官场风气。为了得到差委,他们不择手段,各显神通。所以,“一差而数十人争之,一缺而数百人俟之”。^[18] 在专制时代,人脉关系是仕途畅通的重要资本。候补官员要优先获得差委,甚至优缺优差,必须利用这个关系。如果没有,也要创造。如福建候补县丁承禧,初次委署漳浦县,抗不到任,改委漳平县,到任滋扰,商贾罢市,撤省当差,旋委南平县,因学政将及按临,遂求署理崇安优缺”。^[19] 丁承禧有如此大的能耐,就是因为其父与当时的福建布政使是结拜兄弟。所以,“其捷足先登者,非善于钻营,即有所系援者也”。^[20] 厘局是晚清候补官员比较好的差使去处,是众所周知的优差。厘务“委员”已不问其操守如何,但有奥援即可得差。所以,“自兴厘捐以来,各省听鼓人员无不以厘差是谋,夤缘奔竞,相习成风”^[21];要获得署缺、差使的机会,金钱贿赂是必不可少的。如湖北候补道杨宗濂最初被御史邓承修弹劾,改官直隶。后来又遭太仆寺卿延茂、御史屠仁守弹劾,遂革职永不叙用。但是,总督李鸿章与杨宗濂有旧谊,极力为其说项。杨宗濂“报效”2万金后,官复原职。^[22]

其二,在临时署缺和差使时,候补官员常常巧取豪夺。有人将长期无缺无差的候补文官比作即将干枯河中的鲋鱼,众多而贪婪。“一旦借得监河之润,则捧檄色喜,自将不顾一切而惟汲汲然弥补其宦囊。宦囊一日不充,贪心一日不厌,又以当差署缺各有期限之故,益复朝取暮取,冀趁事权在手之候,作孤注之一博”。^[23] 趁机巧取豪夺,是候补文官署缺、当差的群体心理和行为特征,正所谓“一人如是,众人无不如是”。^[24] 厘差最大的弊端就是负有管理责任的候补官员以及

差役的中饱,以至“每年千余万之厘金,归国家者十之三,饱私囊者十之七”。^[25]新式事务包括近代实业也是候补官员“掠夺”的场域,也是最败坏的集中之地。多数候补、候选官员把经办新式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藪,讲究排场,挥霍浪费,安插亲信,挂名支薪。如福州船政局,“岁糜数百万帑金,徒供千百委员开支中饱之用”。^[26]这些候补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置公共利益不顾,为个人谋取好处。

其三,多数“听鼓者”素质低下,行政能力有限,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大量的“听鼓者”中,能员吏才十分少见。同治年间,有人说:“刻下各省候补实任人员,不下数万,而求其五品之州、七品之县寥寥无几。”^[27]这种情况在光绪年间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陈夔龙说:“自捐纳保举之途愈推愈广,仕路既形拥挤,品流更苦烦猥,近来各省候补数以百计,候补同通州县数以千计,其中廉勤练达之才几于十无二三。”^[28]所以,在候补官员大量“听鼓”的前提下,地方大吏督抚还在抱怨差委乏人,于是,到处奏调人员。大量的“听鼓者”被委派从事各种新旧事务,但他们不学无术,对传统事务知之不多,对洋务更是一窍不通。当时来华的一个外国商业考察团在其报告中,记述了这些候补官员的多余与无能。“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看到一种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个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他们是主管官吏的朋友,虽然对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结果导致管理十分混乱。“在大多数事情上,帐目不清,所以经理方面绝对不知道每星期的生产总额。”^[29]在晚清,主持近代性局务的总办、会办和委员,一般由候补官员充当。他们官气很大,但能耐太差。正如沈道梅说:“中国各局之不兴,其弊全在有总办名目。缘为总办者,非府即道,场面阔绰,其应得薪水,不足回旋,势必作弊相蒙,以网无名之利。故办一事则一事坏,主一局则一局败,如风卷潮退,无可挽回。”^[30]

三

如上所述,“听鼓者”的行径推动了晚清吏治的败坏。或者说,晚清吏治江河日下,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作为难逃其咎。相对于实任者来说,候补官员的败坏和无能无疑又是最突出、最普遍的。出现这种状况,与多种原因有关,但与候补官员的来源、素质、规模和晚清的制度体系有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一,“听鼓者”缺乏应有的知识素养和基本的行政经验。各省候补人员既有正途出身,也有异途出身,但异途出身占大多数。清朝捐例规定,具有监生身份的士人才能捐纳为官。表面上看,对捐纳有些限制,但实际上,监生也是可以通过捐纳得到的。只要有钱,任何人都可以捐纳为官,而不问才品。这就使大批没有知识素养,甚至地痞流氓进入官场、俨居民上成为可能。1860年,福建捐例大开,“佐杂微员,积年劣幕,皆捐升道府厅县,其流品直不可考核”。^[31]有些候补官员仅粗通文墨,很难处理繁杂的刑名钱粮,更谈不上应对社会新问题、新事务了。所以,他们一旦临民治事,便措手不及,诸事委之于幕友和书吏。就整体而言,捐纳候补官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与科甲之士有较大的差别。正

途候补官员一般是书斋出身,唯以科举考试为导向。“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32]但科举考试内容不切实际,他们对时务茫然无知。许多官员对此多有批评。张之洞说:“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33]那么,正途出身者的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候补文官的数量规模十分庞大,直接影响其不良行为。根据岑毓英的说法,算起来,贵州在光绪初年,正印官(实任和候补)与官缺之比接近4.8:1,佐杂官(实任和候补)之比达到3.3:1,还不包括在省候补但不合例之员。^[34]贵州作为一个小省,达到如此比例,其他省份候补人员之多,就不难想见。与此相反,地方差委的机会十分有限。大量的候补文官长期“听鼓”,导致多方面的结果。(1)候补文官聚处省垣,整天无所事事,仅有的一点知识和精力耗尽。“相率习为游惰,志气日即萎靡”。^[35]特别对大多数异途候补官员来说,本来先天知识储备不足,后天又缺乏“历练”的机会,他们行政低能和无能就是很自然的结果。(2)候补官员或许借债捐官,而且绝大多数候补几、十几年,没有差委,他们也就没有任何官方收入。为支付各种开支,多数已经负债累累。于是,他们只要获得署缺和差使的机会,疯狂地巧取豪夺,才能还清旧债,也才能保证现在和将来的基本生活需要,还不说其他的开支。(3)没有差委,无法得到保举等奖励,仕途升迁之路受阻,他们就转而求利。有人分析候补官特别地“求利”的原因时说:“此辈目的既在以办厘务为发财之径,其不以侵蚀公款肥己者要亦为少数之例外,加以军事时期已过,善办厘金者已不能按例奏保,遂使失一向上之途,有志者固不因此坏其操守,志卑者遂不得不转而求利”。^[36]这也就是候补官员异常贪婪的重要的心理基础。

第三,候补官员“以官为市”的价值取向也支配其行为。候补官员以捐纳出身的为最多,他们明知仕途堵塞严重,很难得到实缺,但仍然捐纳实官。因为他们认识到,即使没有实缺,只要署缺、委差,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捐官是利可图的。捐例屡次减成,刺激大批人捐买实官,那些“竭蹶集资之流,又往往日暮途穷,视一官为取偿之计,一旦履任,计母取赢,不充其囊橐而不止,纵或终以墨败,而冤典可邀,亦仅降调耳,褫职耳。厚资坐拥,仍不失为富民”。^[37]这些捐官就是把官场当作交易场所。“前之捐官者,必殷实富户世家子弟,今之捐官者多市井无赖、失业游民,百事不能为而后移挪借贷,以官为市。一旦分发到省,得有差委,则索通者已坐踞于其室,不待久困之余,而始难言志节也”。^[38]

最后,制度因素是造成“听鼓者”腐败的重要条件。如晚清捐纳制度风行,实官捐纳时间长,还多次减成;借助保举制度,大吏常常滥举。于是,大批无德无才之人混迹于官场,导致地方候补官员数量十分庞大,素质非常差;清朝俸禄制

度也不合理,候补官员在署无人之缺时,只有一半的官俸。在一些常设的非经制机构为委员时,也只有不多的收入。候补官员从事一般的例差,则没有法定的收入,只是地方官送些车马费。在无缺无差的日子,则没有任何官方收入。所以,对多数候补官员来说,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经常靠借债、典当过活;考核、甄别候补官员的制度成为具文,使许多不合格和不法的候补官员没有得到淘汰或处罚。如衙参制度,实际上,在相当多的省份,衙参制形式上还存在,但没有认真持久地执行下去。正如有人指出:“每省候补、试用人员多至千数百辈,虽有衙参之例,类皆有名无实。”^[39]清朝最高统治者多次饬令地方大员考核在省的候补文官,明令地方大员对其考试、考察,“甄别去留”。期满或奏留补用,或咨回部选,或发回原籍。但疆臣大吏“对捐纳报满人员无不保留,一味市恩邀誉,只图见好于人,不顾登进之滥,不辨贤否之别。”^[40]但地方政府大员对候补文官很少裁汰。对此,光绪是不满意的。他说:“国治必先查吏,而驭吏尤在劝惩。各省分发人员,例应督抚切实甄别,原以考查贤否,分别去留,法至善也。乃近年各省期满甄别,类皆宽泛注考,全数留补,无一斥退者。即随时甄别劾罢,亦属寥寥。”^[41]所以,制度、规则一旦遭到破坏,或成为虚文,后患无穷,候补官员的严重败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严昌洪,蒲亨强.中国鼓文化研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 [2] 巡局调员[N].申报,1896-04-06.
- [3] 慎毋躁进[N].申报,1900-11-09.
- [4] 督抚留意人才宜勤于接见僚属论[N].申报,1901-06-12.
- [5] [39]论谕止衙参事[A].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6] 汪叔子,张求会.陈宝箴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7] 张寿鏞.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6.吏政·考课二[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8] [15]何士祁.候补二十一则[A].盛康.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5,吏政·守令中[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9] [13]周询.蜀海丛谈[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10] [19][3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 [23][24]宜今室主人.论开捐例不如兴商务[A].皇朝经济文新编之4,吏治:卷3[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12] [16][4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4] 清吏治说[N].申报,1900-11-14.
- [17] 张之洞.裁汰冗员折[A].苑书义.张之洞全集:卷50.奏议[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18] 朱采.海防议[A].清芬阁集:卷2[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20] 丁日昌.条陈力戒因循疏.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0,吏政类·吏论[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21] 阅报纪拟请免厘因而论之[N].申报,1902-03-11.
- [22] 参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章伯铎,荣孟源.近代稗海.第1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25] 裁卡增税议[N].申报,1901-07-06.
- [26] [29]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A].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27] 周恒祺.请整饬吏治疏(1865)[A].盛康.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2,吏政·考察[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28]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11[M].上海:上海书局1911年刻本.
- [30] 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M].近代史资料:第76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32] 汤成烈.学校篇上[A].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学校下[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33] 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34] 参见岑毓英.遵旨整顿吏治疏[A].葛士藩.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7,吏政二[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35] 锡良.重庆府转飭四川设立课吏馆考核人才札[J].四川档案史料,1984,(3).
- [36]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中国金融经济史料丛编第1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 [37] 李肇锡.请变通正途州县选补班次疏[A].盛康.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1,吏政·铨选[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 [38] 读疆抚陶中丞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疏书后[N].申报,1896-02-08.
- [40]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211[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下转第87页)

中,才能充满生气。如果说女儿阿满之死,曾经给木兰以沉重的打击,那么,对于儿子在抗日战争中再上战场,木兰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了。

三 林语堂的人文理想

林语堂生存的年代,不但中国而且整个世界都处在一片混乱的状态,如何力挽狂澜,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中西文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研究者指出:“林语堂秉承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比较观,以非历史的态度拓展其独特的文化阐释学,试图通过对中西文化传统的人文主义诠释,建构融汇中西的普世文化价值。”^[21] 这种文化思路,使林语堂不同于“欧化派”和“复古派”,从而排除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着重对这两种文化作学理上的平行比较,其思维路径是“长长相加”。林语堂认为西方文化主“攘”,进取有余而智慧不足,缺乏圆熟的艺术精神;中国文化主“让”,虚弱有余而知识不足,缺乏精致的科学精神。林语堂认为中西两方须同时改进,才能使人类文化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因此,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所营构的这个突出的审美时空,看似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游离,显得不合时宜,但其实从深层次来看,恰好反映了作者由乱及治的文化策略。而姚木兰作为林语堂小说的女主人公则在一定

程度上承载了作者的人文使命——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的审美人生。

综上所述,姚木兰是作家林语堂最钟爱的文学形象之一,她在无情命运中尽享人生芳华,在不自由的传统文化园林中自由的翱翔。可以说,她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精神的完美载体,也是林语堂人文理想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 [1] [2][3][4][5][10][11][16][17][18] 林如斯. 关于《京华烟云》[A]. 林语堂. 京华烟云.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卷[M]. 张振玉译.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 6. 79 - 80. 195. 295. 154. 176. 66 - 67. 88. 426.
- [6] [7][8][9][12][13][14][15][19][20] 林语堂. 京华烟云.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卷[M]. 张振玉译.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47. 129. 270. 38. 44. 41. 38 - 39. 38. 503. 482 - 483.
- [21] 陈旋波. 林语堂的文化阐释学浅析[J]. 学术论坛, 2001, (5): 120.

Esthetic Life in Variable Destiny

——A Probe into Lin Yutang's Cultural Ideal

LI C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in Yutang's literary works were once criticized in the past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factor of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etc and his English novels were misunderstood by Chinese readers by reason of translation and so on. But the novel *Moment in Peking* by Lin Yutang made a unique esthetic world for the readers, and ha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Lin Yutang's cultural ideal.

Key words: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Yao Mulan; destined tragedy; esthetic life; cultural ideal

(上接第51页)

Negative Influences and Its Causes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Which "the men of pending drum - sound" Bring abou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 Zong - zh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man of pending drum - sound" is an imaginative appellation to local reserved - officials having official title but waiting for real official position. The amount of reserved - officials greatly exceeds the social requir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worse behavior of reserved - officials results in destructive influences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The corruption of reserved - officials is part of the overall corruption of official circle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expounds briefly concept of reserved - officials, quality and ways of their job. The paper not also discusses emphatically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which reserved - officials brings about, but analyzes four main causes well.

Key words: "the man of pending drum - sound"; lat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negative influences; causes